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

上

張元濟題



書目題跋叢書

莫伯驥 著
曾貽芬 整理

中華書局

書目題跋叢書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

上

莫伯驥 著
曾貽芬 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莫伯驥著;曾貽芬整理. —北京:
中華書局, 2016.9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7-101-07438-3

I.五… II.①莫…②曾… III.藏書樓-圖書目錄-中國-民
國 IV.Z84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04549 號

書 名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全二冊)

著 者 莫伯驥

整 理 者 曾貽芬

叢 書 名 書目題跋叢書

責任編輯 李肇翔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39 $\frac{1}{8}$ 插頁 4 字數 900 千字

印 數 1-3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7438-3

定 價 120.00 元



五十萬卷樓藏
書目錄初編

江安傅增湘題



東莞莫氏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

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渤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愛日精廬藏書志》，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

者”，逐一著明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爲“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

有鑒於此，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6年6月

整理說明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莫伯驥撰。

莫伯驥（1878—1958），字天一，廣東東莞人。弱冠即入縣學爲生員，後就學於廣州光華醫學堂，畢業後從事商業經營，同時還幫助其兄做日報編輯，而性喜購古書，藏於福功書堂，練積三四十年如一日，藏書達五十餘萬卷，有“上企瞿楊，無慙丁陸”之譽，遂改藏書處爲五十萬卷樓矣。莫氏所藏善本甚富，其間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舊抄、精校、舊校，以及孤本、稀見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寫本、名家藏本等等。莫氏不僅僅是位藏書家，而且是位兼學中西的淵博學者，“收得之書，每爲題記”，義兼述作，“書之內容亦由茲可考”，他認爲這樣做，“似經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莫氏將部分題記編爲《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二十二冊出版，收經史子集四部書九百餘部，其間宋刻本占4%、元刻本占近11%，明刻本最多，占近54%。對於其他積稿，則有“賡續而隨出”的計劃。不幸的是，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大舉入侵中國，不久攻陷廣州，“倉黃兵火間，五十萬卷書藏，竟爲絳雲樓之續，縹緲之帙或作帷囊，而善本精裝大半灰飛煙散矣”。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莫氏“仍曩者發揚

民族精神，研究鄉邦文化之旨”，爲“立民族之自信”，用科學方法整理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精粹之文史哲藝”，在《初編》的基礎上“刪補增訂”，編成《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初編》與《跋文》是莫氏諸多著述中得以出版面世的兩部書，它們不僅是中國目錄學史中的重要典籍，而且是了解研究“灰飛煙散”的五十萬卷樓藏書的主要依據。

《初編》作爲一部藏書目錄，基本上遵照提要式目錄的程式，介紹典籍的撰者、編者、校者、刊刻者、行款、序跋，以及內容和流傳狀況等，但在撰述過程中並不墨守成規，而是根據典籍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處置方式，取此舍彼，或繁或簡，皆以充分反映典籍狀況爲準的。從而這部書表現出的突出特點就是形式靈活多樣，所涉內容廣泛豐富。

首先，《初編》對所著錄典籍原有的序跋、題識十分重視，凡書前編後有此內容者，通常都會一一列出，而且不以此爲止，或是全文照錄，或是摘引其主要部分。如卷三著錄的宋張栻《癸巳論語解》，只有張栻自序的摘引；卷一著錄的宋黃倫《尚書精義》，前有淳熙庚子龍溪張鳳從道叙的節錄，後有淳熙庚子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書識，此二書全無莫氏只言片字。序跋、題識對於了解典籍的內容、撰述宗旨、刊刻流傳歷程很重要，尤其是在莫氏藏書基本散佚的情況下，這些保存在《初編》中的序跋、題識不僅是了解散亡典籍不可多得的依據，而且是研究撰序者的重要資料。如卷十一著錄宋晏天章、嚴德上同撰之《玄玄菖經》（未註明何種版本），前有至正七年虞集序，次有至元九年歐陽玄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有宋晏天章撰《元元菖經》，永樂大典本，書中有張靖序及不署名氏的跋，未見虞集與歐陽玄的序。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序亦不見於《道

園學古錄》《道園類稿》和《圭齋集》。又如同卷著錄《古今考》三十八卷，明刊本。前題宋鶴山魏了翁華父撰，元紫陽方回萬里續。前有魏了翁自序，次有方回序，然而在方回《桐江集》《桐江續集》中皆未見此序，近年編纂出版的《全元文》亦未收此序。方序後有周南識語云，“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官州幙職，時知方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冢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為言。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於紫陽書院，墨本則藏於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讎其故稿，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圖壽諸梓，以次本藏於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毀於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考》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寧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爭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閒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卧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編，遂傳於時。至正二十年周南書於卷末”。《全元文》所載周南《跋方回續宋魏了翁古今考》，緣自清抄本《海昌叢載》續卷一，只有“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官州幙職，時知方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冢子也。以先君深嗜《易》學，每以魏文靖公《易》學為言，《十七家易集義》為言”幾句話。區區五十餘言，尚未提及《古今考》，更能提及《跋方回續宋魏

了翁古今考》乎？兩者對比，《初編》所載周南識語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據不完全統計，《初編》所載元代序跋、題識不見於《全元文》者就有三十餘篇。憑此可以認為，《初編》引錄的序跋、題識具有珍貴資料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其次，所撰提要內容充實，形式不拘一格。如《初編》卷三著錄明楊慎《轉注古音略》五卷，卷五有“慎按：廿字，諸韻書皆音入，唯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其誤”。莫氏援引《金石記》云，段玉裁注《考工記》，證明“周時凡言二十可爲廿也”。又依秦碑小篆、唐石經、《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古今韻會》《稽聖賦》《增韻》《漢孔龢碑》《漢器款識》等，無有以廿字讀奴店切如念音者，或作廿、或作卅，亦未有作念者。而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開善寺碑宋人題名》中有“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以念爲廿，始見於此。莫氏則根據《湯君碑》稱唐末俗音已有以念爲廿者矣，並認為今俗呼若念，蓋二十有尼至切之音，故又轉而爲念。莫伯驥對廿讀作念的起始、轉化與《轉注古音略》的作者看法不同，但以考辨廿的讀音為例介紹這部書，的確有特點，能激起讀者對此書的興趣。又如卷十三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提要不惜筆墨，記述此書對後世各界的影響，明末李定國、孫可望並爲賊，其後李定國殉身緬海，人亦謂其受《三國演義》影響。清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是書，順治七年告竣。清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頗多喜讀此書。甚至士大夫且有以《演義》爲正史者，清雍正間，有某侍郎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議馬謖事。清憲宗責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更有甚者，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關瑪法（指關羽）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

瑪法，滿洲語呼祖之稱。此則雖可笑，却足證《三國演義》之深得人心，比一板一眼地介紹書的內容，更有說服力。卷二十二著錄《湖湘校士錄》，是書收文乃萬曆甲寅所試湖廣全省十五府四州及各縣前列諸學廩增附生時文中優者。提要關注此書的文體——八股文，援引焦循《易餘籥錄》稱“八股出於金、元之曲劇，曲劇本於唐人之小說傳奇，而唐人之小說傳奇，爲士人求科第之溫卷，緣迹而求，可知其本”。而八股文的運用、影響並不限於科場，焦循稱“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莫氏既知八股“雖不足語於通人，然綿歷數百年，關於歷史甚巨”，所以他着重記敘了八股文的發展脈絡，讓更多的人了解八股文。

《初編》是一部藏書目錄，版本狀況的介紹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並不限於一般內容的描述，會根據典籍版本的具體情況，在深入研究了解的基礎上，對某一方面做充分細緻的闡明。卷十四著錄《妙法蓮花經》是宋刊卷子本，於是介紹圍繞着卷子本展開，“前人謂宋初去古未遠，書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尚是烏絲欄之舊，大抵用單邊，書惟左右雙邊。南渡流風既遠，於是始有四周雙邊刻本”，刻書版框從單邊發展爲四周雙邊，而此宋卷子本則用單邊，可見其仍遵古法也。此書黏合數紙而成卷子，糊經久不脫。莫氏對此頗感疑惑，最終從《疑耀》卷五得到答案，“古法用楮樹汁、飛麝、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糊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又引陸烜《梅谷隨筆》謂，修補古書漿黏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而此卷子本“有一接縫不脫，其餘略脫而仍不離”，莫氏稱“足見前人工巧，當是施用前法”。而對於卷二十一著錄的《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則

因其爲日本五山板本，吾國著錄家多未之及，故稍詳五山板之略史。“五山板之書，爲日東舊本，酷類吾國宋元槧刻，其本多出僧侶，亦爲緇徒文事之一。五山者，蓋合京都及鎌倉之禪刹而言，如京都之刹，則爲南禪、天龍、相國、建仁、東福、滿壽也，鎌倉之刹，則爲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也，高行有學之僧徒，多聚於此。凡奉使中國及交涉文稿，諸僧多舉其職，當其時並以雕刻佛典及中華經籍爲事，除京都、鎌倉各寺外，凡同其宗法諸寺，所刻各書，總名爲五山板，皆漢文也，有片假名者甚少。招聘華工以濟其事，楚材晉用，又當時之軼聞焉”。不論是揭示宋卷子本“堅如膠漆”的秘密，還是所述五山板的略史，對於讀者而言，都算得上是意外的收穫。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初編》對與所涉內容有關聯的部分，做了材料翔實、令人信服的介紹。卷七著錄《咸淳臨安志》九十六卷，此書卷首有張氏燕昌飛白題字。莫氏以“伯驥按”的形式介紹飛白，“李氏兆洛稱飛白書相傳出於蔡邕，見役人墜帚，因以成字。六朝人多能之，而流傳絕少，惟墨池堂帖刻‘江南之人兮’五字，云衛夫人書，然無確證。唐、宋後所傳，則多帝王所書者，亦尠見遺蹟也。《玉海》謂宋真宗見飛白筆，遂爲飛白書，是飛白別有筆矣。飛白之白，古文原作帛”。“吳越陸白齋紹曾、海鹽張文魚燕昌同輯《飛白錄》二卷，後附張燕昌《論飛帛文》一篇”，“蒐輯頗詳，古今人之工飛白書者略備”。又如卷十七著錄岳珂《玉楮詩稿》。岳珂乃岳飛之孫，有《金陀粹編》《續編》《籲天辨誣錄》《桎史》《愧郗錄》等，莫氏稱《宋史》中岳珂事實附《鄂王傳》甚略，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絀於初”。又《杜杲傳》“珂爲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鎮

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怒，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其無虧，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宋史》附傳之寥寥數語，殆亦有所諱而然。此二例，前者給了我們有關飛白的知識，而後者告訴我們，岳珂除了是忠良之後並多有成就之外，還有斂財等另一面，可以客觀、全面地評價岳珂。這已經超出了對這兩部典籍的認識範圍，如果沒有淵博的知識功底，很難想象能做到這樣。

指出典籍的錯漏，不限於著錄的典籍，從另一側面顯示《初編》的學術水準。如卷十七著錄《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此書《四庫》未收，阮元補呈而識其意見，《研經堂外集》卷一有《重編海瓊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提要》，其中有曰“前有端平時推官潘枋原序及嘉熙元年耜所書《事實》一篇”。莫氏指出“枋，阮氏誤作枋。嘉熙間彭耜所撰《海瓊玉蟾事實》，阮氏又脫去彭字，致不成文，未審何故”。潘枋字庭堅，《宋史》卷四二五有傳。莫氏引《齊東野語》“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後夢有人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枋，跌宕不羈”。謂“庭堅之易名為枋，實緣夢話，阮氏誤寫為枋，蓋考之未諦也”。又如卷三著錄《爾雅》二卷，為滁山堂舊藏，“卷末有‘滁山書堂’大方章，當是盱眙吳尚書棠遺本。棠號仲宣，官蜀最久，致仕寓滁州，故有此章。平素則以‘望三益章’掄於各藏本也”。莫氏又引張之洞《廣雅堂詩集》中《滁山書堂歌》“忽憶家園萬牙籤，蛛絲蠹迹無人掃”。並注云，藏書甚富，率皆善本舊槧。莫氏又據《嘉興府志》卷五二載，知吳棠嘗聘秀水高均儒校勘經籍，說明吳棠是對典籍流傳有貢獻的著名藏書家，而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却缺載，莫氏以為當補之。

莫氏對新發現的資料和罕見的資料很敏感，也很重視。卷二十一著錄明崇禎癸酉趙宦光仿宋刻本《玉臺新咏》，爲了說明此本的情況，徵引“近歲敦煌發現《玉臺新咏》殘卷”，此殘卷“起張華《情詩》第五編，訖《王明君辭》，存五十一行，前後尚有殘字七行，諸詩皆在《玉臺新咏》卷二之末”。又因“近人嘗以今本與此比勘，異同甚多”，莫氏認爲也可以和明仿宋刻本互校，於是原文照錄。“張華《情詩》第五首，‘巢居覺風飆’，今本誤作風飄。《雜詩》‘容與綠池阿’，今本綠誤作緣；‘同好逝不存，迢迢久離析’，今本逝誤作游，久誤作遠；‘無然徒自隔’，今本然誤作愁。潘岳《內顧詩》‘忽然擣絺綌’，今本擣作振；‘引領訴歸雲’，今本訴作訊；‘不見陵間柏’，今本間作澗。……”以上諸條足以證明敦煌殘卷與今本之高下，而且在今本與仿宋本均可通的情況下，也是以仿宋本爲勝，敦煌殘卷的引入，更說明了仿宋本是優於今本的善本。又如卷五著錄《大明實錄》殘本，乃明晁氏寶文堂舊藏。此書卷首有晁瑬《藏書銘》楷字章，莫氏稱“此銘僅見於是書，前人著述，似未及也”。於是提要中全文照引：“曹誠廣舍，真廟賜名。丁顗聚書，子孫繇興。匪學胡成，匪書胡學。蓄斯貽後，珍如渾璞。龜蒙緝借，張公却鬻。咨我同志，遵此軌躅。鬻爲不孝，借爲一痴。咨我後昆，戒之敬之”。晁瑬是明代著名藏書家，這《藏書銘》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衆多藏書家藏書的目的和態度，是研究中國藏書史的一份珍貴資料。

第三，利用按語這一形式，拓寬了徵引材料的空間，並能注入自己研究的心得和感悟，從而提高了提要的學術性。卷八著錄《職方外紀》是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的敘述域外地圖的典籍。提要介紹了楊廷筠的序、瞿式穀、許胥臣、